

重庆地方志资料丛刊

# 重庆辛亥革命时期人物

辛亥革命暨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专辑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

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地方史研究室

编



重庆地方志资料丛刊

# 重庆辛亥革命时期人物

辛亥革命暨重庆蜀军政府  
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专辑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地方史研究室

一九八六年十月

重庆地方志资料丛刊  
**重庆辛亥革命时期人物**  
辛亥革命暨蜀军政府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专辑

---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地方史研究室  
重庆师范学院印刷厂 印刷

1986年10月 第1次印刷

---

书号：〔86〕第34号（内部发行）。

## 《重庆地方志资料丛刊》

### 编 辑 说 明

《重庆地方志资料丛刊》系由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办、由重庆市地方志总编辑室负责编辑的一种内部书刊。

丛刊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和严谨的学风，重点登载为编纂重庆市地方志搜集整理的史实资料，有选择地登载本地区的一些志稿，藉以征求史志学界专家、学者和各级领导、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达到核证史实、提高志书质量的目的。

丛刊不定期出版。在市内发行，并与各省、市志办交换。希望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帮助我们把这套丛刊办好。

1986年9月

书名题签：张文澄

《重庆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编辑组

主编 陶維全

编委 郑洪泉 肖堂炎 李志勇  
王抡擅 王憬秋 王斌  
刘中一 庄燕和

## 目 录

序	孟广涵	( 1 )
邹 容	宋兴华	( 4 )
吴玉章	杨世元	( 11 )
杨庶堪	李志勇 唐润明	( 17 )
张培爵	黄天朋	( 25 )
朱之洪	唐润明	( 33 )
夏之时	王 斌	( 39 )
谢 持	黄炳琛	( 46 )
向 楚		( 51 )
熊克武	周富道 马宣伟	( 55 )
但懋辛	周道富	( 62 )
吕 超	马宣伟	( 68 )
石青阳	王 斌	( 75 )
任鸿隽	唐 田	( 79 )
李湛阳、李龢阳	刘中一	( 83 )
陶闿士	陈宛茵	( 89 )
曾纪瑞	彭伯通	( 93 )
任鸿年	王文琛	( 96 )
况春发	李志勇	( 98 )
李肇甫		( 101 )
张树三		( 103 )
卞小吾	卞稚珊	( 105 )
邓鹤翔	马 璇	( 109 )
王培菁	刘晓甦	( 112 )

程德音	马 麦	(114)
廖树勋	廖文化 程晴初 阳仲裕	(116)
刘云裳	长寿县政协文史办	(120)
李蔚如	蒲国树	(123)
杨锦云		(130)
饶国梁	胡齐畏	(132)
张桂山	肖堂炎	(137)
陈文峰	蔡 墓	(140)
刘赓唐	周浴凡 田 琦	(142)
周克山	<u>张顺之</u>	(144)
龙国桢	罗静远	(146)
谢仲容	谢宏常	(150)
林肇开	王明耀	(152)
黄晓辉	封式成	(154)
杨宝民	杨肇甫	(155)
陈懋昭		(157)
李天钧		(158)
张森楷	唐唯目	(159)
宋育仁	彭 珙	(163)
端 方	骆兆伦	(167)
胡景伊	李志勇	(172)

#### 附录 1：蜀军政府组成人员表

附录 2：重庆及属县各保路同志会负责人名单	(179)
附录 3：重庆籍同盟会员名录	(180)
附录 4：重庆辛亥革命暨蜀军政府成立概述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	李志勇 (197)
后 记	(209)

# 序

## 孟 庚 汤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重庆同盟会党人组织革命武装，依靠人民支持，宣布重庆独立，次日，组织蜀军政府——同盟会革命党人在四川建立的第一个省级革命政权，并将民主革命浪潮推向四川全境。虽然辛亥革命成果很快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重庆蜀军政府亦因成渝两地军政府的合并而结束，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归于失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就历史地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得以胜利完成。但是，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是长存的；重庆蜀军政府的建立及其艰苦的斗争，在四川和重庆革命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值兹辛亥革命和重庆蜀军政府建立七十五周年之际，为了缅怀革命先辈，记叙重庆地区辛亥革命史实，总结历史经验，以激励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统一祖国、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斗志，特编写了《重庆辛亥革命时期人物》这本纪念专辑，并把它作为重庆地方志资料丛刊的首卷。

这是一本专门记叙辛亥革命时期，在重庆地区进行活动的历史人物事迹的史料书，共收人物传记和简介近五十篇。为之写传或作简介的有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为共产主义者的杰出革命家吴玉章和为参加黄花岗

之役而英勇就义的革命志士饶国梁等人；有早年就追随孙中山在重庆开始革命活动，后来成为蜀军政府的创建者或主要成员的杨沧白、张培爵、朱之洪、谢持、熊克武、但懋辛、夏之时和向楚等人；有为当时重庆及重庆属县长寿、江津、涪陵、綦江、大足、铜梁等县的独立、起义和反正起过重大作用的况春发、廖树勋、邓鹤翔、李蔚如、杨锦云、张桂山和周克山等人；还有早年为鼓吹革命而被反动统治者杀害的革命英烈卞小吾。他们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不少人还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更为可贵的是，那些在青年时代就积极从事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志士，后来随着历史潮流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又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勇敢地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不少人还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也还有一些人在民主革命遭到失败，当历史出现曲折的关键时刻，退出了革命营垒，然而他们在辛亥革命时期，顺应历史潮流的行动，还是应当肯定的。在当今中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四化”，乃全体炎黄子孙的共同意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继承先辈遗志，就要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不断进步，并为之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还收录了宋育仁传。这是因为，尽管宋育仁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保路运动中他又站到封建买办阶级一边，但他于十九世纪末叶在重庆、成都等地办报纸介绍欧美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宣扬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后来又鼓吹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总算给万马齐喑的四川知识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为一代有志青年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确实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此外，本书还收录了清王朝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刽子手端方和袁世凯在四川的党羽胡景伊两人的传记，目的是想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辛亥革命时期重庆复杂的历史状况，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发展规律。

我祝贺《重庆辛亥革命时期人物》出版，我相信，它对于研究四川辛亥革命史以及编写重庆地方志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九八六年九月

## 邹 容

宋兴华

邹容（1885—1905）原名桂文，又名绍陶、威丹、蔚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一八八五年，出生在四川省重庆府城内的夫子池洪家院子。父亲邹子璠除在重庆经商外，还行商于沪、汉之间，也到成都、广州和西安等地做过生意。

邹容六岁发蒙读书，他天资聪颖，在私塾的五、六年时间里，读完了“四书”、“五经”，还读了《史记》和《汉书》等历史著作。他轻蔑功名利禄，对八股文很反感，十三岁参加巴县童子试，因主考官出偏题刁难考生，愤然罢考，并对一再要他猎取功名利禄的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①向封建科举制度提出了挑战。随后他在重庆经学书院学习期间，同儒生进行辩论，更是“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②“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③邹容由于思想激进，反对儒学教条，不久便被书院除了名。邹容厌弃旧学，热烈欢迎新学，一八九八年，他受到戊戌维新思潮的影响，到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向日本人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学习英语，同时广泛阅读新书时报，吸收西方民主思想，开阔政治视野。戊戌变法失败，当谭嗣同遇难的消息传到重庆时，他十分悲痛，把谭嗣同的遗像悬挂在自己座旁，并写诗表示哀悼，诗云：“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④他决心继承“维新”的事业，为革新中国而献身。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邹容同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

一样，决心留学日本。一九〇一年七月一日，邹容去成都参加官费留日学生考试。考取后回重庆整装待发，却突然被四川总督奎俊以“聪颖而不端谨”<sup>⑤</sup>的“理由”除了名。经过多次力争，他父亲才允许他自费留学。同年九月，他离川去沪，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并书《有感诗》，借以明志述怀：“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sup>⑥</sup>

一九〇二年八月，邹容到达日本东京，进入神田区同文书院学习。邹容留日期间，结交了一些革命青年，阅读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一些著作，如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以及美国独立史、法国革命史等书籍。同时还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〇三年春节，在东京留日学生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他发表慷慨激昂的反清演说。一九〇三年三月底，邹容因反对清政府派往日本的留学生监督姚文甫，被迫回国。

一九〇三年四月，邹容回到上海，住爱国学社，结识章太炎。在章太炎的帮助下，积极参加爱国学社的活动。四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张园召开的拒俄大会上，邹容登台演讲，严厉谴责沙俄侵占我东三省的强盗行径，“滔滔辩论，旁若无人”，<sup>⑦</sup>给到会者以强烈的印象。之后，他又同保皇党人冯镜如组织的所谓“国民议政会”（又名“四民公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月，邹容为了加强学生的团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sup>⑧</sup>毅然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但因邹容不久被捕入狱，中国学生同盟会没有组织起来）。

与此同时，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经开始编写的《革命军》一书，并将这份书稿交给章太炎润色；章太炎赞赏不已，为之作序，称誉它是“雷霆之声”。<sup>⑨</sup>《革命军》在这年五月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苏报》发表了章太炎为《革命

军》写的序言。《革命军》是邹容对辛亥革命的最大贡献，全书七章，共二万余言，文字通俗，旗帜鲜明，锋芒毕露，矛头直指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

《革命军》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言书。邹容在书中热情地讴歌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sup>⑩</sup>的神圣事业，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革命之所以是伟大绝伦的事业，是因为它能使人类“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去奴隶而为主人”。正是基于此种认识，邹容便把革命当作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看成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他以青年人那种血气方刚的气概，急切地向往革命：“大怪物哉，革命也，大宝物哉，革命也”“吾今日闻之犹口流涎而心痒痒，”并愿为此伟大事业“呼天吁地，破喉裂喉”贡献出自己毕生精力。邹容呐喊要革命，以革命争生存求独立，这对于唤醒人们起来冲破那黑暗的旧世界，砸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作用。

《革命军》是声讨清政府的战斗檄文。《革命军》一开头就声称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邹容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均厉行专制政体，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却将人民的天赋权利剥夺一尽，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国家积弱、民众受难的根源。而清王朝则集封建专制制度之大成，对中国人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封建压迫。邹容指出，中国的士农工商都受封建专制的清王朝的压迫和摧残。政治上，“一国之人”毫无民主可言。既“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政权”，又没有言论和出版结社的自由。在清政府的封建淫威之下，广大人民的身家性命得不到丝毫的法律保障。经济上，广大劳动人民惨遭残酷剥削，那些遍布穷乡原野之间的农夫们“终日劳劳而无时

或息者”，“受田主之土豪虐待不足”，满清政府还要派官吏“多方刻之。”在这里，邹容虽然没有触及到封建的土地制度问题，但他对劳动农民的深切同情，却是难能可贵的。《革命军》还揭露清政府严重压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指出关卡林立，捐税名目繁多，“实则敲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强烈要求解除封建束缚，发展民族工商业。此外，《革命军》还无情地揭露了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的文化统治政策和摧残进步知识分子的种种罪行。

清政府之所以必须推翻，还因为它是一个民族的大牢狱。自清入关以来的二百多年间，它一直推行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盘踞上方，驱策汉人，以坐食其福。故祸至则汉人受之，福至则满人享之。”当官“皆满缺多于汉缺”。八旗派驻各省又专用于防范汉人。因此，邹容指出：“贼满人为我同胞之公敌，为我同胞之公仇……吾今以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主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逐凌我之贱满人。”这鲜明地表现了邹容强烈的反满民族意识。

清政府之所以必须推翻，还因为它是卖国的政府，洋人的朝廷。邹容认为清王朝不仅是国内民族的牢狱，是专制主义的化身，而且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邹容指出，清王朝推行一条“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主义路线，大肆拍卖国家领土主权，“若台湾，若大连，若胶州，若广州湾”，都拱手送之于外人。就连他们自称为祖宗发祥地的东三省也企图“再拜顿首奉献于俄罗斯”。他们唯帝国主义之命是听，“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邹容得出结论说：“当今之中国，内受满州之压制，外受列强之驱迫，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他主张“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反帝必先反满，反满为了反帝。以革命求独立，以打倒走狗来达到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压迫，这说明他

的反满民族思想，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意义。

《革命军》是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邹容强调革命后要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新国家。邹容把它定名为中华共和国，而且还拟出了建设这个新国家的二十五条政纲。邹容的方案是：在这个国家里“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一律平等，不分贵贱，人人都享有言论、思想、出版等天赋之自由权利，同时人人也有“承担国税”和忠于新建国家的义务。这个国家在政治组织形式上，实行议会制度，议员由各州县选举产生，总统由各省总议员投票公举，“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这个国家还将制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宪法和法律，均以美国的宪法和法律为蓝本；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在对外关系上，邹容严肃指出：“中华共和国为独立自由之国”，“与各大国平等。”这一纲领充分表现了邹容《革命军》对外要求民族独立，对内要求民主自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

邹容在《革命军》的结论部分满怀信心地憧憬这个新国家的美好前景。他写道：“尔祖国之名誉飞扬，尔之独立旗已高标于云霄”，“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呼！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他最后响亮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邹容提出的建设新国家的方案，既批判了君权神授论，否定了君主专制政体，也不同于改良派主张的以民权来分君权，以立宪来限制君权的君主立宪的主张，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则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变君主专制国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思想，在当时是动员人民起来革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武装了当时的革命者，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这本书出

版后，风行海内外，总印数达一百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中的第一位，影响十分巨大。

《革命军》一问世，清政府大为恐惧和仇视，惊呼：“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sup>⑪</sup>“此书逆乱，从古所无”。<sup>⑫</sup>不久，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一九〇三年六月三十日章太炎被上海租界工部局逮捕，邹容抱着生死与共的态度，于七月一日自动到租界巡捕房投案，入狱，被英租界公审公断判刑二年。邹容在狱中英勇不屈，对洋法官据理辩驳，理直气壮，与战友章太炎作诗唱和，要“同兴革命军”，<sup>⑬</sup>去埋葬清王朝。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邹容在帝国主义迫害下，死于租界狱中，年仅二十岁。

邹容死后，人们纷纷追悼他，上海和日本的一些革命刊物刊载诗文沉痛哀悼。辛亥革命后，在南京的川籍革命党人以吴玉章为首，倡议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举行四川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亲临哀悼；会后，又以临时大总统名义签发命令，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同时，吴玉章等四十名川籍革命党人还联名呈请孙中山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对邹容家属给以优恤，认为“设非其人提倡（革命）之早，其书（《革命军》）入人之深，今日收功恐难若斯之速”。<sup>⑭</sup>重庆的蜀军政府还把邹容列为四川死义烈士的第一名，加以表彰。一九二四年章太炎作《赠大将军邹君墓表》，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书写刻石于墓地。一九四三年，重庆市将原夫子池洪家院子至苍坪街原邹家祠堂一段街道改名为邹容路。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建立邹容烈士纪念碑。邹容在重庆的友人还筹集资金，在杨家坪办起了邹容中学。一九六一年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吴玉章写了《纪念邹容烈士》诗，末尾两句是“风雨巴山遗恨远，至今人念大将军”，<sup>⑮</sup>表达了新中国人民对邹容深切的纪念。